

贵族出身 志在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

贵 族 少 年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月（公元 598 年 1 月），在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李家的宅邸中，李渊夫人窦氏为刺史李渊生下了第二个男孩，这便是后来的大唐皇帝李世民。

李家的先世据说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东）人，自十六国以来将近二百年，一直是关陇贵族。李世民的八世祖李暠，在西晋末据敦煌、酒泉为王，建西凉国，自称凉公，也就是凉武昭



隋文帝

王。据说李勣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儿子李敢之后。李广曾祖李仲翔，为汉初将军，曾讨伐叛羌，在素昌阵亡，素昌即唐代的狄道。李仲翔的儿子李伯考葬父于狄道东川，从此定居该地，后来成为西州右姓大族，所谓陇西李氏。至李勣的儿子李歆时，西凉为匈奴贵族沮渠蒙逊所建的北凉所灭。李歆之子李重耳逃奔南朝的宋国，后来

归附北朝的后魏，任弘农太守，不久被宋将薛安都所攻陷，又改任后魏豫州刺史。李重耳的儿子李熙，任金门镇将，定居武川，后又迁至南赵郡，从此李氏世居昭庆县。赵州原隶属于巨鹿郡，与山东大姓李氏居地之旧常山郡邻接，李熙的儿子李天赐，为后魏幢主。李天赐有三个儿子，第三子李虎任后魏左仆射，封为赵郡公。那时，后魏政权动荡，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后魏孝武帝受贵族官僚高欢胁迫，逃往关中。不久，大将宇文泰谋杀孝武帝，改立元宝炬为帝，称西魏。李虎握有一部分军队，积极参与了这场宇文泰为首的政变活动。西魏开国，李虎与宇文泰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人以佐命之功，皆封爵为柱国，号称“八大柱国”。李虎官拜太尉，还特蒙西魏皇帝的宠幸，赐鲜卑姓大野氏，李氏家族的声望权势至此达到了高峰，所谓“当时荣盛，莫与为此”。李虎先是迁家冯翊郡同州治所，宅居城西北，建有宗庙，宇文泰常去同州探视，与李虎交谊很深。后来李氏一家又定居京兆府的三原县（今属陕西）。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篡魏建立周（北周）政权时，李虎已死，但由于他佐魏有功，被迫封为

唐国公。唐，即取三代唐尧之义。因旧常山郡（即后来之赵郡）所属的唐县有座尧山，李氏先封赵郡公，现又封唐国公，也就进一步明确地把李家的先世托附到三代唐尧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即是李世民的祖父，北周时袭爵为唐国公，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全家迁居长安。北周天和元年（公元 566 年）李渊出生，七岁时父亲昞逝世，承袭唐国公。



窦氏

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出身于鲜卑贵族，京兆平陵西人，父亲窦毅在北周官拜上柱国，继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公主。隋取代周、窦毅封为定州总管、神武公。据《新唐书·后妃传》记载，窦氏出生时，头发下垂过颈；3岁时头发与身体等长。窦氏聪颖异常，读《妇诫》、《列女传》等书，过目不忘。她受养于宫中，深受北周武帝的宠爱，不同于其他甥男、甥女。武帝驾崩，窦氏像亲女儿那样悲痛。不久，北周杨坚自立为皇帝，窦氏自投床下，说道：“我自恨不是个男儿，不能救舅家的祸难。”窦毅马上捂住女儿的口，说道：“不要乱讲，说这话会灭掉我们全族！”窦毅常对襄阳公主说：“这个女孩子相貌出奇，且又见识不凡，怎可随意许配人家？”为给女儿择婿，便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凡来求婚的人，每人给两支箭，从门屏背后射中孔雀眼睛者，才允许婚配。射者超过数十人，都没有“中目”。李渊最后射箭，“中各一目”，窦毅于是把女儿许配给李渊。

婚后，窦氏为李渊生有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和一女。李世民的出生地武功，坐落在渭水北岸。在世民的童年、少

年时代，父亲李渊在各地担任地方官，因而教育孩子的重任便落在母亲窦氏的肩上。在李世民的童年、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母亲，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许多良好的教益。窦氏天资聪明，有着较好的文化修养。她善写文章，又写得一手好字，以至于把她同丈夫各自写成的手书混在一起，人们都难以分辨出究竟是出自哪一位的手笔。史书还记载这样一件事例，足见窦氏颇有见识。李渊喜爱并养了许多良马，炀帝继位后，窦氏向丈夫劝说道：“皇上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喜好这些东西，您为何不挑选几匹良马献给他？将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只能招来罪过，不会有什么好处。”李渊没有把夫人的劝告当回事，不久便遭到炀帝的谴责。后来，李渊见炀帝施政昏乱，滥杀大臣，出于确保自身安全的考虑，多次向炀帝进献鹰犬名驹，炀帝果然欢喜，提拔他担任将军职务。然而，此时窦氏已因病逝世。回想起夫人当年的劝告，李渊动情地向儿子们说道：“早些听取你母亲的劝告，很久以前便可以得到将军职务了！”说着说着，不禁落下泪来。

窦氏的婆婆独孤氏年老多病，平时性情又很严肃，规矩很多，窦氏的妯娌们都很怕老夫人，不敢进前服侍。惟有窦氏服侍婆婆能曲尽孝道，独得欢心。老夫人患病期间，她尽心服侍，常常月余衣履不解，昼夜守护在婆母的身旁。童年时代的世民见母亲尽心服侍奶奶，对母亲越发崇敬，发誓长大后一定要使母亲能得到补偿。

窦氏良好的文化修养、非凡的政治见识、高尚的品德品质，给李世民带来深刻影响。

总之，从李暹到李昉的兴衰，说明这个家族是根底很深的军事贵族，崇尚武功，子弟自小就要演习弓马、读兵书，一旦有战争，就要带兵征战。而这种人家的子弟，也把军功看作主要的晋升阶梯。他们往往因握有军权，在政治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长期分裂割据的年代，李氏家族或者割地为王，如李暹或者参与改朝换代的政变，如李虎至李渊则亲眼

目睹了杨坚篡周的事实。在上述年代中，李氏家世经历复杂，沉浮无常，种种经历使这个家族富于冒险精神，并有政治上的野心。

李世民出生时，当朝皇帝是隋文帝杨坚。李氏家族同杨氏家族有着亲密的裙带关系。杨坚的祖先也曾后魏时出镇，移家武川，与李氏经历大致相同。杨坚的父亲杨忠，与李虎同为后魏“八大柱国”之一，而且居于同州。李虎居州城西北，面朝涑水，杨忠则居州城东南，面临大路。两家东西相望，仅隔二里路，平时过从频繁。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时，杨忠被封为隋国公。后来杨坚与李昶成年，都娶独孤氏姊妹为妻，两家进一步联为姻亲。李昶死时，李渊年幼，杨坚对这位小外甥，加意照顾。他任北周宰相时，恢复了李氏汉姓，称帝后，先授李渊为千牛备身，后又任他为地方官，曾任谯、陇、岐三州刺史。

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李世民年已七岁。这一年杨坚的儿子杨广杀兄弑父，篡取了帝位，称隋炀帝。李渊与杨广在亲戚关系上是姨表兄弟，李渊年长三岁，其甥女王氏又是杨广的后妃。因此杨广称帝后，李渊的优厚地位并未改变，一直到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前后，与隋政权的关系基本上是密切的。大业初年，李渊被任为荣阳、楼烦太守，后还朝转为殿内少监。殿内省属隋中央政府机构五省之一。殿内少监为殿内省长官，专掌朝廷供奉诸事，秩从四品。大业时郡太守秩分三品、正四品、从四品三等。李渊被封为殿内少监，不至于降级，据此可以知道李渊任郡太守时其秩当为从四品。由于李渊从地方调至中央，因而他一家又返回长安。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李渊迁卫尉少卿，秩正四品，掌管朝廷宫殿警卫事。后来隋炀帝发动征辽东的战争，李渊在怀远镇负责督运。杨玄感起兵反隋时，他又奉命驰驿坐镇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成为负责方面的大臣和军事将领。

李渊在隋朝的官品始终在三品以下，没能进入枢要的行列。其原因是由于李昶的过早去世。关陇贵族的特点是爵位世袭，

可官位仍须凭勋功和才能授予。由于李渊生前没有显赫的建树，死时李渊又年幼，加上隋统治者在篡周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非杨氏的关陇贵族，一再实行打击、排斥的政策，这多少使李氏家族在仕途上蒙上一些暗淡的色彩。李渊给长子取名“建成”，二子取名“世民”，也就是取其建功立业、济世安民，以重振门望家声的意思。这既是他对后辈的期待，也包含着他本人不满于现状的情绪。当然，由于裙带关系，李渊在隋朝廷中的地位毕竟是优越的。随着李渊年龄的增长，朝廷又提供了他发挥才能的舞台。特别是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李渊由文官转为武官，并一再迁升，这对于一个军事贵族的后裔来说，意味着重彰先祖旧业的时机来临了。而在大业九年，李世民刚好十六岁。

在家庭中，李世民享有关陇贵族世家子弟所能拥有的一切。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他做了大唐帝国的皇帝，他还不时地对臣下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谈到在青少年时代家庭所给予他的一切。世民兄弟四人，弟弟玄霸夭折；而同父异母兄弟，至少有 15 人之多。一个贵族家庭之中，有这么多兄弟们整日里一起学文习武、玩耍游乐，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丰富多彩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说童年时代的世民，在母亲的教诲下养成了喜爱读书、爱好文史并能写得一手好字的习惯的话，那么，使他更感兴趣的则是从他的军事贵族家庭中接受军事知识和骑射的训练。他从小便练习弓马骑射，驰骋猎场。由于身强体壮，他又严格要求自己，他所用的箭比一般人所用的要大一倍。在百步之外，他能“射洞门闾”，足见其武艺精湛。读兵书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世民对曹操所注释的《孙子兵法》非常感兴趣，对这些兵书能够倒背如流，在少年时代便能就《孙子兵法》的理论同父亲谈论兵策，使父亲感到世民在众兄弟中确实有超群的见识。

世民的父亲李渊是个射箭的能手，因射技高超而得以同窦氏结成婚配；世民的岳父长孙晟，也是能够一箭贯二雕，使突厥可

汗大为叹服。世民因此对演习骑射怀有极大的兴趣。对于骑射，李世民做了皇帝后曾回忆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又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从李世民的表白中可以看出，他在青少年时期虽然也爱好文史和书法，但不是一介文弱书生，而是善于骑射、强悍骁勇的贵族子弟。他性格倔强豪放，从小便养成了“刚烈”的性格特点。在隋末的动荡年代里，李世民正是从家庭的传统军事教育中培养出了相当的军事本领，使得他在日后的军事斗争的大舞台上，为唐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

解雁门之围

隋朝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中国社会四百来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称帝后曾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诸如设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加强中央集权；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在地方政权上实行州、县两级制，以节省国家开支，便于政令的传达；建立科举选官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和控制；在经济上颁布均田令，采用租庸调制度，减免赋税，颁布“输积法”以打击豪强势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注重水利建设；将府兵制度推行于全国，镇压江南豪族叛乱等等。这一切，使得隋朝的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全国各地粮仓中储存的粮食数量不可胜数。在手工业方面，著名工匠李春所设计的赵州石桥，至今仍保存完好，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其他如纺织业、造船业亦有很大的发展。在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陆法言的《切韵》，都堪称一代名著。这一时期，在同边疆各民族的联系上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中原与中亚地区已开辟了三条主要交通要道。总之，在隋朝统一后的短短时期内，社会经济、文化事业获

得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国势强盛的局面。

另一方面，隋朝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社会矛盾也呈现出某种程度上激化。隋王朝的建立，是隋文帝杨坚以外戚的身分通过辅政的方式取得的，他不懂得安天下必须先安百姓的道理，因而在施政方针上，他所实行的均田制度并没有解决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他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征收，来增加国家仓库中储存的粮食，据后来的估计，足以供五六十年的食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开皇十四年（公元 594 年）关中地区出现大旱灾、人民无粮可食的情况下，隋文帝表面上表示同情人民的疾苦，但仍不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是命令关中灾民到河南洛阳地区“就食”，自谋活路。在史书记载中，隋文帝是以节俭而著名的。但在事实上，他下令大兴土木，在岐州修造仁寿宫，工程期限紧迫，被致死者多达几万人。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他有时不按法律条文办事，晚年“喜怒不恒”、“用法益峻”，促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等到隋炀帝继位之后，这个昏君的暴政致使社会矛盾立即空前地尖锐起来。

隋炀帝杨广，于公元 604 年迫不及待地将其病重的父亲杀死，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炀帝上台后，立即向全国征发大批民工，大兴土木。他下令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的民夫多达 200 万人，死者十有四五。他调动大量民力，从五岭、江南地区向北方运送奇材怪石，营建宫殿和苑囿。他在洛阳西面修建的西苑，方圆 200 里，苑内宫殿无数，亭台楼阁林立，工程十分浩大。为乘船到江都游玩，他下令征调上百万的民夫开凿运河。人民为了躲避徭役，往往自己伤残自己的肢体，称为“福手”、“福足”，可见人民竟被迫害到何种悲惨的地步。特别是隋炀帝自公元 612 年至 614 年向辽东地区发起的征讨高丽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终于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隋炀帝征讨高丽，以山东的东莱和河北的涿郡为军事基地，因而给河北、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大业七年（公

元 611 年），山东、河北发生大水灾，淹没了三十余个郡县，大批农民在谷价腾涌、饥馑四起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土地。而隋炀帝却不顾灾民的死活，加紧准备对高丽的战争。这一年的十二月，邹平人王薄率众占领长白山，举起起义的大旗。王薄自称“知世郎”，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起来反对进攻高丽的战争，贫苦农民大多投向他，起义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

在王薄起义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平原人刘霸道聚众数万人，占据了“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的豆子豳；章南孙安祖聚众数百人，占据了高鸡泊；清河人张金称则率众活跃于劄县的河渚地区；蔺县人高士达，则聚众活动在蔺县一带。

大业八年（公元 612 年），隋炀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仍然发动了第一次对高丽的战争：陆军从涿郡出发，海军从东莱海口出发。结果，在高丽军民英勇抵抗、隋军士气低沉不愿作战的情况下，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以大败而还告终。

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隋炀帝不顾各地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和第一次东征的失败，又发起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沉重的战争负担，迫使更多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投进了起义军的队伍。这一年，济阴人孟海公、北海人郭方预、齐郡人孟让、河间人格谦、平原人郝孝德、渤海人孙宣雅等相继聚众起义。各路起义军队伍，少则数万、多则十多万人，至此反隋农民起义已经形成第一次高潮。

在农民起义浪潮中，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大业九年，当隋炀帝率大军在辽东征伐高丽之际，负责运输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越国公杨素之子）在黎阳重镇起兵反隋。为夺得国家政权，杨玄感提出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的口号，每天投奔到他旗下的民众有数千人之多，形势对他十分有利。然而，杨玄感在战略上屡屡失误：从黎阳渡过黄

河后攻打守备力量很强的洛阳，四五十天未能攻下，致使隋炀帝得以从辽东前线率大军返回河南洛阳；杨玄感匆忙中又率军西入关中，在隋军追击之下，连战连败，最后自杀身亡。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隋炀帝杀戮了大批官员，统治集团上层人人自危，对农民起义军的反隋斗争的形势更为有利。

大业十年（公元 614 年），一意孤行的隋炀帝不顾危亡在即，又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然而，农民起义军从山东、河北发展到河南、江淮、山西、关中的事实，迫使隋炀帝不得不从辽东前线匆匆收兵，班师回朝集中力量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

从大业十年至大业十三年，隋军与各地农民起义军之间战事接连不断，农民起义军队伍此起彼伏，并且在反隋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强大的武装：在河南，有以翟让、李密为首的瓦岗军；在山东、河北有以窦建德为首的义军；在江淮有以杜伏威、辅公祐为首的义军。在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冲击下，隋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各地豪强和地方军事将领相继起兵，占据一方，隋王朝覆亡的大局已定。在这种形势下，关陇贵族太原留守李渊的晋阳起兵，引起了全局形势的变化。

大业十一年（公元 615 年）四月，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于是李渊携家迁往河东。这年八月，炀帝巡视北部边境，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围攻。隋朝时，突厥是北方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西魏时期，突厥势力逐渐强大，它占有的土地东至辽海，西至西海，南到沙漠，北至北海。然而至隋朝初年，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在西面的为西突厥，在东面的为东突厥。突厥虽然不断侵扰隋朝边境，但自从其分裂之后，势力衰落。到隋朝末年，由于炀帝统治残暴政治腐败，连年用兵，于是东突厥乘机又强大起来，成为隋朝北方的重大隐患。始毕可汗围困炀帝于雁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雁门郡共有 41 座城，被突厥攻占了 39 座，只有雁门和崞县没被攻破。雁门城内军民 15 万人，存的粮食仅够吃半月，形势危殆，如同累卵。



李世民居雁门之围

炀帝想要以精骑突围而出，大臣樊子盖提出了不如守住城消耗敌人的锐气，征四方兵入援的建议。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一面慰劳、犒赏守城将士，一面等待援兵。当时 18 岁的李世民应招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营。他向将军提出建议：始毕可汗举全国之兵围困我天子，一定是认为我们仓猝之间没有援军。只要我们摆开阵势，让军旗在数十里上飘扬，晚上击鼓示威，敌人一

定以为援军到了，望风而逃，不然，我们寡不敌众，不能战胜他们。这的确体现了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的性格特点。云定兴采纳了此计，突厥果真以为“王师大至，由是解围而遁”。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新、旧《唐书》把解雁门之围写成是李世民的功劳，这可能是源于唐代《实录》，有意夸大了太宗功业。而《隋书·樊子盖传》的记载是：“其后援兵稍至，虏乃引去。”这种记载比较符合实际。其实，“援兵稍至”中就包括了云定兴按李世民“多赍旗鼓以设疑兵”的建议作部署在内。在这次退突厥之兵中，李世民初次显示了军事才华。

大业十二年，李渊被封为太原道大使。大业十三年升任太原留守。当时，李渊把建成、元吉安置在河东将世民带至太原。李渊把世民留在身边，这与他雁门献计解围和平时的善谈兵书、好弄弓矢是不无关系的。

李世民随父亲到太原，不久便参与了镇压甄翟儿所率领的农民起义的军事活动。甄翟儿是魏刀儿起义军的将领，自称“历山飞”率众十多万，北连突厥，是李渊实现自己抱负的一大威胁。大业十二年，魏刀儿的别将甄翟儿率众骚扰太原，隋军将领潘长文被打死。为此，太原留守李渊率兵征讨，李渊与副留守王威率五六千人与历山飞的部众二万余人大战于西河郡雀鼠谷，遭到敌军包围。于是，李渊采用李世民雁门解围的策略，“分所将兵为二阵，以羸兵居中，多张幡旗，尽以輜重继后，从族旗鼓角，以为大阵。”随后，李渊率数百精兵，在李世民配合下，终于冲出起义军的包围。《旧唐书·高帝纪》所记载的“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足见李世民在雀鼠谷解围和击败义军的斗争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自从随父亲来到太原后，又结交了一批豪友。诸如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文静等人。

在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隋政权四分五裂，发生了进一步分

化。大业十二年底（617年初），罗艺在幽州起兵反隋；十三年（617年）正月，山东豪族徐圆朗攻破东平郡；二月，朔方豪族梁师都杀死郡丞唐世宗起兵；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起兵；四月，金城校尉薛举起兵；七月，武威豪族李轨拥众起兵；十月，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起兵，拥罗县县令肖铣自立为王。这些人中，有的是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封建军阀，有的是地方豪族，有的是失意的关陇贵族后裔，有的是南朝覆灭政权的后代。他们在各地纷纷起兵，表明隋统治集团内部已分崩离析，隋王朝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这一切严峻的现实，对暂时还留在隋统治集团营垒内的李渊父子，不能不引起深深的触动。继续为隋王朝卖命，来维持功名利禄，还是改弦易辙，卷入倒隋斗争的洪流？何去何从，关系到李氏家族的兴衰存亡。他们不露声色地观望着变幻莫测的风云，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自己的前途。李世民就是在这种激剧的社会变动中，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跨入了青年的旅途。

晋阳起兵 初露锋芒

晋阳兵变

李渊作为一个关陇军事贵族的后裔，在隋王朝的政治地位与他拥有无上尊荣的先世相比，是明显下降了。种种迹象表明，隋炀帝对李渊怀有猜忌之心，而李渊一家对隋皇室也抱有怨恨。李渊妻子窦氏原是北周皇族，在杨坚篡周建隋时，她就曾痛哭流涕地说：“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炀帝大业年间，李渊有骏马数匹，窦氏对李渊说：今皇上好鹰爱马，公有所知，此马不可久留，宜即上贡，否则必招身祸。李渊不听，果然受到炀帝的谴责。后窦氏病死，李渊为求自安之计，多次搜求鹰犬进贡，不久果然提升为将军。李渊对儿子们说，我要是早听你们母亲的话，居此官久矣。当然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种勾心斗角的内在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激化。再加上李渊跟隋炀帝是亲戚，除了君臣关系外，又多了一层血缘关系。李渊一家基本上是忠于隋杨政权的，炀帝对李渊也是基本上信任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李渊父子可以通过建立军功这条道路，来达到提高自己地位的愿望的，而这条道路对他们来说也是现实的。在全国反隋斗争爆发之初，隋炀帝一再委李渊以重任；而李渊父子基本上采取忠于隋杨政权的立场和态度，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策划了对历山飞农民起义的镇压，然而就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

荼；也有地方贵族、豪强势力趁机起兵占据州县，割据一方。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刘元进起晋安，皆称皇帝；朱粲起南阳，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号楚王；邵江海据岐州，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号长乐王；王须拔起恒、定，号漫天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号吴王；李密起巩，号魏公；王德仁起邺，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号博山公；罗艺据幽州，左难当据泾，冯盎据高、罗，皆号总管；梁师都据朔方，号大丞相；孟海公据曹州，号录事；周文举据淮阳，号柳叶军；高开道据北平，张长契据五原，周洮据上洛，杨士林据山南，徐圆朗据兖州，杨仲达据豫州，张善相据伊、汝，王要汉据汴州，时德叟据尉氏，李义满据平陵，慕容顺据青、莱，淳于难据文登，徐师顺据任城，蒋弘度据东海，王薄据齐郡，蒋善和据郢州，田留安据章丘，张青特据济北，臧君相据海州，殷恭遂据舒州，周法明据永安，苗海潮据永嘉，梅知岩据宣城，邓文通据广州，俚酋杨世略据循、潮，冉安昌据巴东，宁长真据郁林，其别号诸盗往往屯聚山泽。

其实李渊的反隋之心也非自一日始。《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唐朝建立后，宇文士及前来投唐，并与李渊谈及往事说：“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当时，李渊笑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宇文士及降唐是在武德二年二月。照这样计算，李渊与士及密论时事大概在大业九年上半年。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九年正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这时，



李渊像

李渊任卫尉少卿，督运于怀远镇，途经涿郡，才与宇文士及有这次密谈。据史籍记载，李渊与裴寂等人在太原所“言天下事”，都是起兵反隋之事；李渊在涿郡与士及所论时事，自然也是指反隋之事。李渊既然敢同宇文士及论及这种大事，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事实也是如此，当李渊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并与李渊“相互引重”。李渊与士及这次“密论时事”，也许与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有关。杨玄感于大业九年六月起兵于黎阳，许多贵族官僚子弟都依附于杨玄感而参加起兵，可见当时在上层分子中，反隋的思想是较为普遍的。也许李渊、士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论及天下大事的。但杨玄感的起兵很快被镇压下去，李渊只好把反隋的心事压下来。比如说，当李渊受命为弘化郡留守，握有关右十三郡重兵；他的妻兄也曾劝他，于玄感起兵时“可乘其便”反隋。但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便以“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加以推托。由此可见，李渊的反隋思想显露于大业九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李渊同炀帝潜在矛盾的加深，到了大业十一二年时，他的反隋思想进一步明朗化，并最终成为晋阳起兵的

思想动因。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李渊十分注意网罗人才。他指示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建成、世民则倾尽财力，礼贤下士，只有有一技可用之人，无论出身皆养于门中，所以众人归心。当时，地主阶级中一些有政治眼光的人，已经认识了隋朝的灭亡已是必然之势，因此纷纷寻找着自己的政治依托和靠山。而李渊父子则是最佳人选并且是他们的希望所在。



刘文静像

在李世民“密招豪友”的过程中，刘文静、裴寂为酝酿起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文静字肇仁，据《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此人“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李渊来太原出任留守，文静通过一段观察后，认为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文静又通过私下对李世民的观察，认为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因而对裴寂说李世民不是非常之人，乃天纵英才。后来，

刘文静因与瓦岗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李密结为姻亲，被隋炀帝下令投入太原大狱中。李世民深知刘文静是一位可以共同图谋大事的人才，便私下到狱中探望他。刘文静见李世民到狱中看望自己，心中明白他为何而来，便十分高兴地说道：“天下之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李世民回答说：“卿安知其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

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图谋共举大